

张伟
著

『多余人』 论纲

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



东方出版社

“多余人”论纲

—— 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

张 伟 著



東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黄金山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

ISBN 7-5060-1071-2

I. 多…

Ⅱ. 张…

Ⅲ. 文学-人物形象,多余人-文学研究-世界

N.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7368号

“多余人”论纲

DUOYU REN LUNGAN

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

张伟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1201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7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5060-1071-2/G·189 定价:17.25元

序 一

季美林

我虽滥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之列，又写过一些别人认为是比较文学的文章；但是我对比较文学实在没有下过工夫，视野狭隘，涉猎肤浅，从来不敢以比较文学家自居。现在承张伟女士垂青，送来一部分她的力作《“多余人”论纲》的稿子，这对我简直是启蒙之举，“多余的人”的问题，我过去没有注意过。她向我索序，我实无此能力，只能写几句介乎离题与切题之间的话，以酬她的厚意。

首先我必须对张伟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她在国内外讲坛上讲授外国文学（当然主要是指中国讲坛，否则我们中国的所谓外国文学，到了外国反而就成了本国文学了），垂30年。她有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又不遗余力地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同时又有在学术探讨中开辟新领域的眼光和勇气。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保证。像“多余的人”这样中外文学创作中都有的典型人物，过去研究的人并不多。专就中国来说，张伟女士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德国人民有一句俗话 *Aller Anfang ist schwer*（“一切开始都是困难的”），张伟女士知难而进，谁还能对这样的精神不表示赞佩呢？

尽管名称不同，但是在世界文学创作中确实有“多余的人”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张伟女士追踪这个人物形象，探讨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美国文学等等，追本溯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由得你不信服。但是，我相

信,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中,也不会缺少这个典型的。仅就张伟女士探讨的范围而论,上下二百年,纵横几万里。从社会发展的观点上来看,有封建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性质不同的社会都产生性质相同或者类似的“多余的人”这样一种典型人物呢?其中原因必有其共性,这需要探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其间的特殊性。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多余的人”,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既有学术意义,又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以上只能算是刍荛之议,供张伟女士参考。

1998. 4. 6

序 二

刘 献 彪

1995年末,我和几位同行于烟台主持召开比较文学教学教材研讨会,有幸认识了张伟女士,得知她在研究世界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后来又几次通过信函交流关于“多余人”研究的一些看法。出我所料,历经两载,她在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竟拿出了2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翻阅这一大摞手稿,仿佛看见了我同时代的一批饱经风霜、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自强不息地寻找逝去的生命和蹉跎的岁月,一生忠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今又以勃勃的生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我作为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并写入序中,以表示对作者这种创造性精神劳动价值的肯定和钦佩。

文学研究是精神劳动,精神劳动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个性化特点。张伟是一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颇具个性的学者,她的书稿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大胆探索的精神,这对于研究者是难能可贵的。

探索精神是一种开拓和创造精神。人类社会在探索、开拓和创造中发展前进,文学艺术也是在探索、开拓和创造中繁荣昌盛的。文学发展史也可以说是文学探索史,探索既是繁荣文学事业的动力,也是发展文学研究的母机。在文学研究中发扬探索精神,既有利于打破陈旧的研究框框和思维定式,也有利于形成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因此,这部书稿从对宏观整体框架的建构到对微观具体

问题的判断体现出的执着探索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其一,书稿首次对文学中“多余人”这种“世界公民”进行“人口普查”。作者在对世界各国文学中近百名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进行普遍细致勘测的基础上,重点选择了7个有较大影响国家的20多位名作家的近30余部作品深入剖析,从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推出近30个“多余人”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散居于世界各国文学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多余人”,经过作者系统的考察和梳理,第一次集合在一起,各展风采,成为规模空前的世界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大荟萃。

这种本应靠联合行动或接力赛跑来完成的万里长征,却由一个人独闯难关,不仅需要耐力、毅力和广博厚实的功底,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探险,是一种颇有气魄的探索,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其二,书稿按各国“多余人”问世时序排列,决不是简单的形式组合,而是对各国“多余人”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律性揭示。全书清晰地缕出世界性“多余人”现象嬗变演化的历史轨迹,几乎构成了一部“多余人”形象发展史。同类型人物的集合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任何个体都处于整体比较状态,以便按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出前人和后人的亲缘关系和变化历程。本书按德、法、英、俄、日、中、美的顺序排列,从整体上看,各国“多余人”鼻祖出现的时间几乎没有交叉和重叠的;再透过表层看他们的渊源关系,自然地形成了递接连锁式的影响循环。的确,世界上没有不受外来影响的文学,也没有不影响他国的文学,而且不论何种影响,首环生命力都特别强大。“多余人”现象也是如此。

其三,书稿中认同德、英、美三国有“多余人”典型,也属首次出现的新的判断。作者在翔实占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囿于某些思维定式的局限和偏见的束缚,突破了某些传统的误区,不仅对已经公认的“多余人”重新审视,有一些匡正,而且在深入论证的基

基础上,对尚未得到认同的同类形象大胆地提出新的判断,拓展了“多余人”现象研究的新疆土。判断不在标新,一旦言之成理,就是探索中的发现,就是成果。

其四,首次郑重地把中国的“零余者”列入世界“多余人”行列,并驾齐驱地参与比较。不是按惯常思维模式,一谈“世界文学”,中国就是例外。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文学的大洋也不能缺少中国文学的辽阔海域。本书跨出了“中日文学”、“中俄文学”的小范围双边比较,进入了世界范围的大市场,进行多边的、实力上的较量,把本来就在创作实践中已经发生和实际上早已同世界文学汇合了的“中国文学”,通过对“多余人”精神本质的内在联系纽带,首次庄严地向世人宣告:我们无愧于世界文学。

其五,全书始终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集合同类典型,东西方交叉、各国交叉,追根溯源,寻找其间的异同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既展开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又展开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同类典型的横向联网和纵向传递的某些内在规律。这样跨越时空的比较,确有一种地球很狭小的现代感。

既然是探索,有时就难免幼稚和失误。但我以为,只要有新的开拓,得到新的认识,给人以新的启迪,即便是失误,也还是面朝真理的。

对“多余人”的探索,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探索,具体地说是知识分子探索,特别是对情感复杂丰富的青年心灵世界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文明社会文明人的探索,它极具恒久性和普遍性。这种文学审美世界中的人物是很独特的,由于他不是生活中的“多余”,也就不是文学中的“多余”。只有在世界文学发展到近现代,彻底打倒了“神”的权威,文学中才可能出现更接近普通人的可喜现象。正如狄德罗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伟大与渺小的

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以此眼光看待“多余人”，就不会把“多余人”的文学现象视为“禁区”，更不会有谈虎色变之感。也只有这样，才会正确认识中外作家笔下“多余人”形象的美学价值、文学中“多余人”现象的国际性的必然和研究“多余人”的学术价值。

作者探索“多余人”现象，与其说是为了进一步开启中外文学史上这道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五光十色的文学景观，不如说是在面对几个世纪积淀下来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面对“多余人”这种特殊而复杂的群体，探索他们丰富而神秘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的对话。因此，与其说她是在研究文学，不如说她是在发表自己对于人的见解。我想，可否这样说，张伟对“多余人”现象的探讨，实是以人为本，对人的问题以及人与其环境、时代的深刻关系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正是她这部专著的价值和个性所在。

这就是我作为书稿的第一位读者的最初感受。

丁丑岁末于山东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长期以来各国都在扮演狐狸和鹤这样的角色。如何把鹤贮藏的食物放到狐狸桌前，把狐狸贮藏的食物放到鹤的桌前，这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勃兰兑斯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导论 研究现状一瞥	(1)
一、写V字形的左半	(1)
二、写V字形的右半	(6)
三、在一个大参照数下	(13)
四、一个新命题的萌生	(19)
五、“多余人”研究之我见	(23)
六、“多余人”之世界现象图示	(25)
第一章 德国 “烦恼者”	(29)
一、维特之“烦恼”	(29)
二、“维特热”	(37)
第二章 法国 “世纪儿”	(48)
一、“维特式”的勒索们	(48)
二、“局外人”阿尔道夫	(56)
三、“世纪儿”沃达夫	(63)
四、“世纪病”蔓延	(71)
第三章 英国 “拜伦式英雄”	(82)
一、“漂泊者”哈洛尔德	(82)
二、“孤傲的反叛者”康拉德、曼弗雷德	(90)
三、“拜伦式英雄”的影响	(97)

第四章	俄国 “多余人”	(110)
	一、回归真朴的“俘虏”和阿乐哥	(110)
	二、“智者”恰茨基	(116)
	三、“鼻祖”奥涅金	(122)
	四、“当代英雄”皮却林	(129)
	五、“身外客”别里托夫	(135)
	六、“巨人”与“侏儒”罗亭	(141)
	七、“时髦人物”阿加林	(149)
	八、“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	(157)
	九、“忏悔贵族”们	(162)
	十、“白老鸦”福玛	(171)
	十一、当代“多余人”伊戈尔	(178)
	十二、“多余人”辉煌的高峰	(185)
第五章	日本 “逃遁者”	(209)
	一、受“排挤”的内海文三	(209)
	二、“逃遁者”应运而生	(215)
第六章	中国 “零余者”	(226)
	一、“自叙”的“沉沦者”	(226)
	二、“孤独者”魏连殳	(234)
	三、“零余者”接踵而至	(242)
第七章	美国 “反英雄”	(257)
	一、“遁世”少年霍尔顿	(257)
	二、“看不见的人”无名氏	(263)
	三、“落难英雄”约瑟夫·赫尔索格	(270)
	四、“反英雄”姗姗来迟	(277)
余论	(289)
后记	(292)

导论 研究现状一瞥

本书所摭谈的国际性的“多余人”现象，是借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一久负盛名的“商标”，指称、集合与探讨在世界各国所遇到的同类典型。

本章内容，包括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多余人”研究情况的扫描，我称之为狭义的研究；包括对世界各国文学中与俄罗斯“多余人”相近似典型的探讨趋势的一瞥，我称之为广义的研究；还包括这种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的新命题以及对这一命题之我见和图示。

一、写 V 字形的左半

回眸我们对俄国“多余人”历史的认识，即本世纪 80 年代之前所走的曲折轨迹，我们称之为写 V 字形的左半，或者说是从高峰滑向低谷。

本世纪初到动乱年代结束前，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难于冲破禁区。

同世界各国文学相比，80 年代前，俄国文学对我国的影响最大。据统计，直到 1966 年前，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俄苏文学名列前茅，从未间断地涌入国门。特别是“五四”当时，对俄国进步文学的介绍与研究蔚然成风，不少作家从俄国现实主义文

学中得到民主主义的启示,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懂得“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①瞿秋白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都集中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②(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五四”时期的革命作家们,把俄国文学作为“目标”之后,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形成了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以此使自己的创作“有所为”,成为“改革社会的器械”^③。其实俄罗斯古典文学从世纪初开始已成了中国人启蒙教育的圭臬。直到后来“一边倒”地学习“老大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策,“良师益友”的苏联文学又成为我们学习榜样时,俄罗斯古典文学还是备受青睐,或许因为它是苏联文学的宗祖,我们爱屋及乌吧。

我们深知,古典的俄罗斯文学,即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19世纪前半叶,几乎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描写“多余人”题材,如果抽掉了“多余人”形象,就等于无视这部罕见惊人的文学史的精华,就等于抛弃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的主体部分。同世界各国文学相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能这样如此全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②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序》,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版。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面地集合着一群成功的同类型形象。它所发生的世界性影响，也是别国同类形象无法企及的，那就是它使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介绍翻译俄罗斯文学，就是在寻求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内部的进步力量。遍布文坛的“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①毋庸讳言，我国老一代作家和翻译家，有谁没受到过去乡下庄园试行改革的奥涅金忧伤情绪的感染，有谁不为“当代英雄”皮却林内心反省的深刻而激动，也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以罗亭在拉夫列茨基庄园的关于人生的演讲而振奋，同时也为无奈远走他乡的别尔托夫和“躺卧不起”的奥勃洛摩夫而感慨惋惜！那么，“五四”时期的一代进步作家由于同俄国文学，还有日本和西欧文学的这种特殊关系，必然反映到他们的创作实践上。从2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陆续地出现一批中国式的“零余者”，不仅无法否认俄国文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更无法否认这批“零余者”与“多余人”的血缘关系。

特别应提起注意的是，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受其影响，我国作家创作的“零余者”，也是从有益于“社会改革”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但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某些遗憾，那种“急需”时期的广泛汲取，出现了囫圇吞枣的现象，直接造成一些作品的幼稚粗浅的毛病。因此，在“全面肯定”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

① 《辞海》缩印本，第8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

视野的狭窄最容易不顾事实地接受权威理论和不加分析地自作聪明，扼杀思索的智慧，固守传统天地。建国后，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步入“正规化”时期，基本是按布罗茨基的《俄国文学史》和季莫菲耶夫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①的传统模式，进入了按国别文学所谓深入研究的条块，始终没有超越权威定性的局限，或许因为这是基础研究阶段的必要的谨慎。另外，当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庸俗社会学观点，使人戴着有色的放大镜，又因为“左”的思想干扰，“多余人”形象本身的致命弱点在放大镜下自然膨胀。当时分析人物个体形象的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它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标准，为此不断地指责古典文学不具备最先进的观念。正如动乱结束，“第二次解放”后，权威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由于缺少一种摆脱封建束缚的权利观念，也常常把外国文学中反映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时期正当要求理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以常常给曾经向封建社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人道主义加上调和阶级矛盾、放弃阶级斗争的罪名。”^②奥涅金等形象就曾被裁判为“只考虑个人得失”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如果不是因为批判的需要，“多余人”还真难以有这一席之地呢。历史总是这样无情地嘲弄别有用心的批评家，矮子越批评巨人，挨批评的越巨大，批评人的越矮小。其次，由于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化品位和研究视野的局限，这段历史时期“多余人”问题不可能成为评论者注目的中心，也

① 《俄国文学史》，孙绳武与蒋路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殷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冯至：《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刊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武汉）。

不可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按国别文学的条块本身就可能进入封闭式研究,即便是对“多余人”类型能单独分类认识,也只是纵向上以个体对应为主,在小范围内,寻找后面的典型与前面典型之间的差异,充其量是将俄国几代“多余人”串起来,前后比较。这种方法就像从圆周为起点走向圆心一样,越走越靠近,最后到达同一点上,难分难解,面面相觑,而且又常常搬来权威赫尔岑的奥勃洛摩夫敲响了“多余人”“丧钟”之说,得出俄国“多余人”绝迹之结论。何况当时“西洋文学不行了”,失去了广阔研究天地,无法进行大跨度的纵横交叉和综合比较,更不可能挖掘各国同类型人物之间的繁衍分合的血统渊源,并从中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对俄国“多余人”形象,基本上处于个体的、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处于对作品整体研究的附属地位,零星散见的某些关于“多余人”的文章也多是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的传播。

进入极左时期,全盘否定“大洋古”,批判“封资修”,“多余人”就连作为沙皇专制政体罪恶佐证和唤起启蒙思想工具的最起码的资格也失去了。在血雨腥风之中,“划时代”巨著,高尔基的《母亲》都不能幸免,谁还冒险去重议奥涅金、皮却林、罗亭等这些最轻也被误定为“中间人物”式的“多余人”呢,他们如禁裔,需小心对待。且不说那时如何蔑视外国文学中的精华,就连已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外国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再谈了,更不用说探讨。作者不愿承认,研究者也不愿去研究外国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中外文学互不相干的假象,至于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似乎根本与我们无关。呜呼,滋补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发育成长的伏尔加河这股清泉被堵塞了,也关闭了所有的窗口。我们从当年满怀激情地介绍、翻译、学习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的高峰,跌入了否定的低谷。在沉寂的近20个年头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显得格外